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当代世界与中国丛书 and China Series

国家利益的 GUOJIALIYI DE

建构主义分析

JIANGOU ZHUYI FENXI

◎方长平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写

国家利益的建构主义分析

方长平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利益的建构主义分析/方长平著.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9

ISBN 7-80115-557-2

I. 国… II. 方… III. 国家利益-研究 IV. D0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2584 号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 83908400

发行电话: (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408

(010) 8390840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7-80115-557-2/D·145

定 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方长平

1968年生人，籍贯安徽桐城，先后毕业于安徽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研究领域涉及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以及东北亚区域研究，目前主要研究兴趣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曾参与《政党与欧洲一体化》、《欧洲联盟的政策与政策制定》、《当代资本主义的演变与矛盾》等著作的撰写和《保守的资本主义》的翻译，并在《欧洲》、《当代亚太》、《国际论坛》发表论文十余篇。

“当代世界与中国丛书”顾问及 编委会名单

顾 问：蔡 武 王 毅 程天权

主 编：李景治

(以下按姓氏笔划排列)

副 主 编：李宝俊 宋新宁 陈 岳

张小劲 (常务) 柴尚金

成 员：王乐理 刘文秀 张 鸣

陈新明 时殷弘 林 甦

金正昆 金灿荣 黄嘉树

程 献 蒲国良

编委会秘书：方长平 阎 瑾

总 序

21 世纪，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往日益频繁，与各国的合作不断扩大，国际影响与日俱增，在国际事务中地位与作用稳步提高。世界密切关注中国，亟待了解中国。而世界也处在巨大的变化之中，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世界社会主义总结历史的经济教训，克服重重困难，在探索中前进，使中国具有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机遇，也面临错综复杂、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更加冷静、全面、深刻、客观地观察世界、了解世界，更加科学、系统、具体地研究世界，以便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以便我们能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尽快富民强国，振兴中华。加强当代中国与世界的研究，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中国更加了解世界，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反映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最新学术成就，促进学术的繁荣、学科的发展，无疑是本套丛书的根本宗旨。

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和生物生命工程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信息技术一方面向更快捷、更方便、更尖端和高智能、高效率、低能耗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由发达国家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扩展延伸，席卷全球。而生物生命工程更是方兴未艾，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据专家预测，以生物学和生物技术为基础的

生物经济产品的销售额在今后 30 年内可望超过 15 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力量，甚至超过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信息经济。有人预言，21 世纪将是生物生命工程世纪。与此同时，以索尼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出井伸之为代表的一些企业家和学者认为，在一些最发达的国家首先是美国，已经开始由信息时代向知识时代过渡，其标志之一是，宽带网络成为社会广泛运用的基础设施。从而可以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利用最方便设备，获取自己感兴趣的任何信息，而不必像现在这样到处寻找信息。信息时代，对于每个人来说信息并不丰富，需要不断地寻找、获取信息，这样获取信息是中心和重点。知识时代，信息极大丰富，“海量”，人们最需要的不再是获取信息，而是不断整理、分析信息。对于个人来说，知识时代的挑战在于能否形成有别于其他人的特征、拥有别人没有的知识和能力。知识和能力成为中心和重点。然而，发展新科技需要良好的基础，优秀的人才，雄厚的资金，先进的设备。而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因此，发展新科技举步艰难。这样，它们同发达国家之间在科技方面的差距就越来越大，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和压力。但是，“科教兴国”已是各国振兴的共同经验和必由之路，也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科技革命直接影响到各国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升降，从而推动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的演变。新科技革命关系到交通、通讯、能源、国际贸易的发展，从而对世界格局产生影响。科技作为手段和工具从一定意义上决定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新科技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当今意义的全球化起自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兴起、深化而不断发展。80 年代中期引起众多西方学者的关注，

开始使用“全球化”这一概念。90年代中期有关的研究达到高潮，并从欧美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扩展。就本意而言，全球化是各国、各地区的经济与社会的联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化和深化。这种强化和深化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它依赖于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交通、通讯手段的改善。从一定意义上说，全球化的进程，它所达到的程度，取决于科学技术进步。新科技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全球化作为一个波及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普遍现象，涉及众多的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其主导因素、主要内容还是经济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资本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主要途径是国际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也就是全球市场经济化。经济全球化借助的手段、方式和方法，越来越先进。信息技术，特别是信息网络，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乃至成为全球化不可分割的部分。跨国公司的影响日益扩大，充当了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和先锋。经济全球化已经和正在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同时，全球化以经济为中心，逐渐向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扩展。西方利用全球化趋势，把自己的政治制度、价值概念、乃至文化推向全球，牟取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霸权，并按照自己的战略需要构建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边缘地位，是被“卷入”全球化浪潮，不得不按照西方国家制定的规则，加入一场福祸难料、前途不容乐观的“游戏”。因此，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来说，经济全球化既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又提出了严峻挑战。我们在抓住机遇、加速发展的同时应当清醒认识、高度警惕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和霸权主义的危害。

进入新世纪，“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前进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都没解决，天下仍很不太平。”^① 国际关系领域的冷战思维依然存在。西方大国无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仍按照冷战思维模式去观察世界，思考问题，判断是非，制定国际战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这必然引起世界各国首先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不满，遭到普遍的抵制和反抗，导致地区局势紧张，危及世界和平。冷战结束后，因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而引发的局部冲突至今仍未平息。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蔓延，一些国家的地区霸权主义明显增强，进行新的军备竞赛，也威胁到世界和平和地区安宁。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正朝着牵制美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方向继续发展，但多极化和单极化的斗争仍是长期的、曲折的。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将是一个充满复杂斗争的长期过程。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在经济、军事和战略方面还占据明显优势。它奉行单边主义，谋求建立由其主宰的单极世界。

“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际战略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把集中全力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全方位地加强本土防卫作为美国“国家战略核心”。为此，它积极组建反恐怖主义国际联盟，加强同盟国、大国和相关国家的磋商。从表面上看，美国的单边主义似乎有所收敛，多极化的趋势渐强。但是我们不能忽

^①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182页。

略问题的另一方面。这就是“9·11”事件后美国通过动员一切资源、使用一切手段进行反恐怖斗争，尤其是通过组建反恐怖国际联盟，强化了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当前的国际环境还是朝着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利于保障我国安全与稳定、有利于我国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方向发展。我们应当抓住美国国际战略调整的时机，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抓住有利时机铲除威胁我国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势力。

与此同时，美国为了实现其战略目标，不断扩充军事实力，大力发展高科技武器。它的2003年国防预算高达3793亿美元，比上一财政年度猛增14.5%，为近20年来增幅最大的一年。现在美国的防务开支已占世界的近40%。此外美国悍然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加紧实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和“地区导弹防御计划”。其核战略进行了调整，并相应制定了核武器应急计划。据美国媒体透露，2002年1月美国国防部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名为《核态势评估报告》的绝密文件，制定了美国新的核计划。该报告明确提出，在一定条件下美国将针对某些国家在战场上首先使用核武器，甚至列出中国等七国为可能的核攻击对象。这无疑会加剧紧张局势，引起人们对新一轮核竞赛乃至核战争的忧虑。对此，中国不能不提高警惕。

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需要我们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国际战略，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首先是周边环境。我国国际战略的制定应当以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宗旨，以科学理论、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为指导，以国家的综合实力为依托，服务和服从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

上述这些无疑是“当代世界与中国丛书”所密切关注和探索的重要领域。与此同时，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不断扩大，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卓有成效。但与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比，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仍处于相对滞后状态，还存在不少问题，面临着进一步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和维护安定团结等复杂艰巨的任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首先是加入WTO，向我国的经济管理、社会管理、政府职能转变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些影响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重要问题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腐败、以权谋私、执法犯法、官僚主义、决策失误、低效率等现象依然困扰着我们。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社会阶级和阶层结构发生变化，传统的单位社会及其相关的人事、福利、保险等制度已不能适应现实生活的要求，人们收入差距拉大，难免产生新的不稳定因素。这些都涉及政治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需要从理论上深入研究，从实践上逐步解决。当前，特别要加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指导作用的研究，着重研究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的重大理论发展和新时期党中央治党治国方略。以上这些也是“当代世界与中国丛书”不能回避的研究课题。

我们的研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为指导；同时又把这一理论及其同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作为我们研究的最重要内容。我们的研究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努力探

索，力求创新。我们也积极研究和借鉴国外相关理论，特别是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和重要学术价值的理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

这套丛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当代世界出版社共同策划。其内容涉及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政治学、世界经济、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学科。已列入出版计划、陆续推出的专著有《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观·战略思考》、《中国国际地位分析》、《国家利益的建构主义分析》、《当代世界中的国际组织》、《美国国会与美国对华政策》、《欧洲政治一体化研究》、《冷战后德国对华政策研究》、《历史上的三次疆独浪潮与新一轮国际大博弈中的中国中亚战略》、《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等，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加工而成。丛书的作者以学院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为主，兼顾国内外著名学者。为了提高丛书的学术质量，我们非常荣幸地聘请了有关领导和专家担任学术顾问。丛书的筹划、出版还得到不少专家的指导、帮助和关心，以及有关单位的资助、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学无止境，我们希望丛书的问题能抛砖引玉，增进学术交流与争鸣，为进一步繁荣学术研究做出有益的贡献。

李景治

2002年8月

序

秦亚青

方长平博士的《国家利益的建构主义分析》应是我国学者使用国际政治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国家利益进行研究的第一部实证性专著。这部著作凝结了作者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至今许多年的心血，也表现了作者认真的治学态度和不倦的探索精神，相信它的出版会在学术理念和分析方法等方面对我国国际政治的研究做出贡献。

选定国家利益的形成这一研究主题是相当有意义的。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的核心概念之一，几乎所有国际政治的理论都无法回避对国家利益的讨论，几乎所有学者都承认国家利益决定了国家的行为。但是，国家利益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人们对国家利益的解读可谓千差万别。实际上，怎样认知国家利益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学学者的争论焦点，也成为不同理论流派的标志性差异之一。尤其是对国家利益的形成这一问题，国际政治学的各种学派提出了不同的回答和解释，其根本差异集中在一点：观念性因素是否能够对国家利益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

新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学说强调客观条件是国家利益形成的根本原因。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相当认真地讨论了国家利益的形成这一问题。他修正了摩根索以权力为中心的国家利益说，提出了以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利益理论，认为任何国家的最根本利益都是自我生存，是国家安全。并且，保障国家安全的基本

手段是国家物质能力的提高，尤其是与国家安全直接有关的军事实力的加强。华尔兹将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政治的基本秩序原则，作为国家行为的第一推动：国家视安全为最高利益，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使然。进而，国际无政府状态又被定义为国际体系中永恒的客观存在，只要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是国家，只要国家享有主权，无政府状态就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由于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国家的安全会时时受到威胁，国家只能依靠自助来保证自己的安全。许多人接受了这一观点，承认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是不可更变的事实，承认在无政府条件下国家的安全是不可更变的最高国家利益，并将这两个理性主义的核心假定视为不证自明的真命题。于是，对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来说，国家利益便成为无需讨论的概念和无需质疑的前提，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和以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利益观也被理所当然地作为研究的起点。应该说，新现实主义的利益观是最简约的利益理论，即：客观条件（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国家利益（国家安全）。这种国家利益观完全排斥了观念对国家利益形成起到的作用。

新自由主义在对待国家利益问题上采取了折衷的做法。由于新自由主义强调国际制度、规范等因素的作用，而这些因素显然属于非物质性因素，并且已经进入了观念的范畴，所以，新自由主义学者无法避开对观念的讨论。后来，国际规制理论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这使新自由主义学者意识到，他们再也不能回避观念在国家利益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了。于是，戈尔茨坦（Judith Goldstein）和基欧汉（Robert Keohane）在1993年联合编撰并出版了《观念与对外政策》一书。在这本著作中，观念的意义被明确地提了出来。新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在国家的对外行为中，观

念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但是，他们对观念的认识却是耐人寻味的。他们首先确认客观条件是一种原因性变量，然后承认观念是另外一种原因性变量，进而，将这两种变量作为并列的自变量：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之下，形成了国家利益。因此，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利益观是：客观条件和观念共同决定国家利益。这等于在新现实主义利益模式上附加了一个变量——观念，用这个附加变量解释单凭所谓的客观现实无法解释的国家行为现象，比如国家之间的合作行为。

国际政治的建构主义理论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注国家利益的形成问题。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无政府性不是永恒的客观存在，它是一种社会性建构，有着不同的逻辑和内涵。国家利益也不是给定因素，是国家在社会性实践活动中习得的理念，国际体系文化中产生的认识。正因为如此，国际利益是一个变量，不是一个衡量。国家的利益是根据国家的社会性实践、根据国家在实践中形成的身份而发生变化的。一个国家的观念变了，其身份就会发生变化；身份发生了变化，国家利益也就能随之发生变化。比如，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和法国一直相互视为仇敌，这种敌对身份决定了双方的根本国家利益是防止对方对自己形成的安全威胁。但是，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两个宿敌开始重新认识对方、重新建构相互关系，逐渐改变了敌对的身份，身份的改变导致了利益的改变。现在，德国与法国之间可以不必相互担心对方威胁自己的安全了。因此，建构主义的国家利益观的根本要素是观念：观念决定身份，身份决定利益。在这里，观念既不是新现实主义利益理论中无足轻重的因素，也不是新自由主义利益理论中与客观条件并列的解释因素。观念成为国家利益最基本的原因因素，成为建构主义利益观的核心。当然，

这里的观念是共有观念，是主体间知识，是文化。

既然观念是确定国家身份的根本因素，进而也是确定国家利益的根本因素，那么，观念是怎样来的？建构主义的假定是：观念、尤其是共有观念，来自行动者的社会性实践活动。这是国家利益的根源。但是，如果据此进一步探究国家利益的形成，就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国家参与什么样的社会性实践活动才能够产生形成身份和利益所必须的观念？三个层面上的实践活动可以导致这样的观念。首先，国际体系层面。国家与国际文化结构、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这类国际层面的社会性因素相互作用，产生了形成国家利益的观念。其次，国内体系层面。国家与国内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相互作用也会产生形成国家利益的观念。第三，国际互动层面。所谓国际互动层面，是指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这一层面介于国际体系和国内体系之间。由于建构主义强调的是共有观念，所以国际层面的互动至少要包含两个行为体。比如，两个国家之间的互动会产生共有观念，这样的共有观念造就了两国之间的文化，界定了两国相对的身份，因此也确定了两国之间的相对利益。

国际体系层面的建构主义研究成果已经很多。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建构主义理论主要是体系层次理论，强调的是国家在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实践中形成共有观念。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实证性研究是玛莎·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表明国家与国际规范之间的互动使国家形成了对自我利益的认识。国内层面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比如加拿大学者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对战略文化的实证研究。虽然，江忆恩并非直接研究观念对国家利益形成的作用，但是，他的研究成果表明，由国家内部产生的文化传统和思

想能够形成人们的观念，进而指导人们的行为。唯独在国际互动层面上的研究仍然比较少见。我们是否可以用建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两个国家之间的互动和共有观念的建构进行实证性的研究？我们是否可以建立一个建构主义的模式，将温特提出的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作为两个国家之间的基本观念结构，据此考量两国之间的关系？在缺乏大量经验性研究之前，我们不能说建构主义以观念为主的利益观具有比其他理论更强的解释能力，但是，这样的分析会为我们研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比如美俄关系。以现实主义理论考量，俄罗斯的一系列让步，是俄在国力衰弱条件下的权宜之计，目的是聚集强大的物质实力，以便将来的东山再起、与美国争霸。但是从建构主义理论的角度审视，就会考虑另外一种可能：俄罗斯试图改变冷战时期苏美之间的霍布斯文化，并将其朝洛克文化甚至康德文化方向推进。如果第二种可能的确存在，北约东扩、美国在中亚的存在等一系列问题对俄罗斯来说就会产生与苏联时期完全不同的意义，因为两国之间的观念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两国的相对身份就会发生变化，因此两国相互的利益也就发生了变化。

方长平博士的著作正是在这些方面做出了富有意义的努力。他在本书中首先厘清了建构主义的国家利益理论，提出了以观念为重点研究内容的国家利益分析框架。他不仅对国家利益的基本概念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而且，在国家利益形成这一重大问题上更是做了潜心的研究和细致的分析。应该说，《国家利益的建构主义研究》一书至少在两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富有意义的启示。第一，作者在与其他理论比较之中，在对建构主义利益理论的重构之中，建立了自己的利益分析框架，并在各个层次上对国家利益的形成进行了比较透彻的讨论。诚然，我们做学问绝不是为